

# 近期三种杜诗全注本的评价

陈尚君

最近三四十年来,国内外唐代文学研究发生巨大的变化,有一段时期杜甫研究则相对寂寞,大约因为积累太厚,突破为难。我特别希望几部杜集新注的出版,能带动杜诗研究的新潮——在中国诗歌史上,杜甫太重要了,是任何研究都无法回避的。

一个半月内见到两种新出的杜诗全注本,一部是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的《杜甫集校注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,简称谢注),另一部是日本下田雄弘、松原朗教授主编的《杜甫全诗译注》(讲谈社2016年6月,全四册,已出二册,简称《译注》),加上两年前萧涤非先生主编《杜甫全集校注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3月,简称萧注)的问世,说最近两年是杜甫研究的丰硕时期,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。

那么,这三种杜集学术定位和编纂特点如何,各具怎样的体例和成就,这是读者希望了解的。以下试述所知。

请让我从相对独立而自具特色的《译注》说起。该书作为讲谈社学术文库创刊四十周年重点书,执笔者多达37位,是继铃木虎雄《杜少陵诗集》(《续国译汉文大成》,国民文庫刊行会1928-1931年)后的第二部杜诗日文全译本。吉川幸次郎的《杜甫诗注》是一项计划二十二卷的弘大工程,到他去世仅出版五卷,2012年兴膳宏教授据遗稿整理开始在岩波书店出版新补,远难很快完成。《译注》是一部吸取中日学界研究成果,以一般读者为阅读对象的普及性大型读本,读本选用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为依据,将萧注列为重要参考书。其内容包括以下几项,一是原诗附训读,二是诗型和押韵的简单说明,三是愿意,讲述主旨,写作时间、地点等,四是现代日语翻译,五是语释,择要解释杜诗中的语释和用典,六是补说,对历代异说,择其重要者作出交代。可以说,其编纂目标是普通日本民众提供全面阅读杜诗的读本,不在学术原创,但在简明定位下,也包含许多刻意的追求。如为说明杜甫的任官,“右卫率府兵曹参军”条,用王勋成《杜甫初命授官说》(《唐代文学研究》11辑,2006)、《杜甫授官、贬官与罢官说》(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》2010年第4期),韩成武、韩泽泽《杜甫献赋出身而未能见即得官之原因考》(《杜甫研究季刊》2008年第3期)三家之说;“检校工部员外郎”条,用拙文《杜甫为郎

离蜀考》(刊《复旦学报》1984年1期,日译本见《生诞千三百年纪念 杜甫研究论集》,研文出版2013)。对杜诗的解读,因为要逐句日译,体会也特别深切。如《兵车行》,认为第9句“行人但云”的讫止范围,异说纷纭,有谓直至诗末皆行人语的,有谓当句而止,有谓到第29句“反是生女好”为止,有谓到第31句“生男埋没随百草”为止,中国注家常会忽略。日本学者的独到见解,也多有揭示,如《三川观水涨二十韵》,《草堂诗笺》认为杜甫之意不在水,每句触及时局。吉川认为是避难山中作,不能及时获得朝廷消息,无必要附会时事。《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》“左将吕虔刀”所指,仇注认为指仆固怀恩,吉川以指王思礼。《三吏》《三别》,中国学者都认为作于归华州途中,铃木虎雄以为写于秦州。一些细节的解读,有许多特别的发明,如《别赞上人》“杨枝展在手,豆子雨已熟”两句,引铃木虎雄说,谓“杨枝”是僧侣剔牙之具,“豆子”是僧侣洗澡洗衣服的豆粉(不是吃的),就很特别。日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解读,在追溯渊源、考究真相、解释制度、体会诗意方面,用力很深,发明亦多,吉川幸次郎《杜甫诗注》即为典范著作。加上现代语译更要求对诗中的任何细节都要作出处置,无法回避,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体会。顺便说到,美国宇文所安教授(哈佛大学)、车淑卿教授(科罗拉多大学)正分别做杜诗全英译的工作,同样值得期待。

主要还是谈萧、谢二书。两年前,我曾在《文汇报》2014年4月14日撰文《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——祝贺〈杜甫全集校注〉出版》介绍萧注。萧注启动于1978年,主体完成于其后几年,中间停顿约二十年,方由张忠纲教授终审通稿完成。谢氏则在他完成白居易诗文集校注后展开,估计最初也有感于萧注似无缘问世,到2012年杜甫逝世1300周年之际初步完成,其后定稿、出版则经历三年有奇。两书是在不同时期独立完成的,萧注出版后,谢氏有机缘参考,但因大端已经底定,估计只能是一些细节

的修订。

萧注的学术目标是对唐宋至清末的历代杜注作彻底的清理,其工作具有集大成的意义。但因历代注杜的成就实在太过丰富,宋即有千家之称,明清两代更是十数倍于宋元,诸家所见,何为发明,何为偏见,要遴选就有眼光的不同。就我之认识,萧注有几点特别值得称道。一是汇校,对十四种宋元旧本作作了极其精致准确的校勘,这一工作以60年代王利器、舒芜等所作十一种宋元旧本校记为基础,复补校三种,可说杜集文本之具第一手价值者大多已网罗无遗。二是备考,对各诗附录有关资料,特别是各诗涉及语意之解读、事实之追究、异文之斟酌、真伪之讨论等等,皆备录前此各家重要见解,向后人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可能。三是解题,对各诗所涉人事、事件、作年、寄意等予以介绍和分析,征引丰富,足资参考。四是注释,几乎对杜诗逐句作充分的解读,说明用典和语源,梳理诗意。以往读萧先生《杜甫诗选注》,很佩服他解诗之缜密与精准,以为足可为初学者指示读诗门径。全集继承了这种注诗的精神,自然精彩。如果借用况蕙风论词的见解,足当重、拙、大之评。这里的拙只是借用,在世风学风浇漓的时代,三代学人坚持数十年,完成如此繁重的工作,没有这种拙的坚持,是很难完成的。

谢注为个人著作,学术定位与前书有很大不同。《前言》说:“本书没有采用集解会注和资料汇编形式,是因为杜诗的有关资料太多,如果全书篇幅过大,头绪过繁,势必给阅读带来某种干扰。”这样的考虑是恰当的。因此,有几方面内容没有涉及。一是“旧注有关诗歌作法、章法的一些繁琐讲解”,如金圣叹、浦起龙讲诗都是这一套路;二是诗歌用韵和诗律问题的讨论;三是不采取逐诗附评点的做法,评点不仅太多,且或浮泛,或繁碎,徒增篇幅,价值不大。此外,在版本对校、编年考证、注释解读、语源典故揭示等方面,也都作了简明处理。尽管如此,全书篇幅仍多达210万字,虽仅萧注的不足三分之一,仍超过仇注近一半篇幅。

以下从校勘、编年、注释、考证,以及今人研究和新闻文献采摭等方面,比较两种全注本的同异。

杜诗底本,二家均采用《古逸丛书》影印清嘉善旧藏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为底本,此本主体源出二王本,配本是吴若本或源出吴若本,其地位确实无法动摇。萧注参校以宋元本为主,校记极其详密,同一字而字形有异者皆出校,虽非全有,但也符合清人校勘原则。蔡梦弼《草堂诗笺》用了三种宋本,将三本之细微差异均揭出。没有用钱笺,但用了很难见到的钱遵王述古堂影宋抄本。谢注定位不作全面繁校,我是赞同的,但认为九家本、《草堂》本及其他宋本的大量宋本,多出自宋人手笔,我则有所保留。尽管宋人确有主观改诗的个案,但无论李、杜、韩、柳诸集,还是《文苑英华》《乐府诗集》等总集,宋人校记的分寸把握是很严格的,很少如明人那样为射利而随意改变窜乱。但谢注选取三种参校本。即九家本、《草堂诗笺》本和钱笺本,我则基本赞同。两年前曾请教张忠纲先生宋本杜集最具代表性之文本,大约也近似。钱笺据吴若本为底本,校记还保留大量樊晃《杜工部小集》和晋开运二年官本的异文,确实很重要,前引述古堂影宋抄本并非钱笺底本,不能取代。

杜诗编年,也是注杜的大问题。一般说始于黄长睿、鲁譬,但追溯到二王本,依循北宋通行的分古今体编次中,大约有作诗先后的痕迹,可以确认始于唐代,且源于作者存稿的大致次第。萧注采取打破各集原有顺序,按照今人考订重新编次,当然是一种处理方式。谢氏认为杜诗仅有半数可以准确编年,其他可大致确定作于某一时期者则占十之三四,无法编年者仍占一定数量,因此采取保存《宋本杜工部集》原来次第,在注释之前就作年及本事有一大体说明,其例甚善。在许多方面,都有新的发现。如《塞芦子》,旧说都认为在至德初叛军陷两京时,谢氏则据诗中“思明割怀卫”句,认为指开元二年九月度兵溃郾下,史思明杀安庆绪后,遣安太清取怀州事,系

年作了较大改动。类似的发明还有很多。

谢氏注释能整合前代诸家成绩,删繁就简,片言得要,值得肯定。就宋、清学者解读所见的采摭来说,于赵次公、蔡梦弼、黄希黄鹤父子,以及明清王嗣爽、钱谦益、仇兆鳌等家引用较多。旧注忽略的官制、科举、军事等专门知识,有较多的补充。对近代以来在唐史研究领域和唐代语言研究方面的成绩,也有所参考。对于前人过分发挥杜诗中的微言大义和时事比附,则仅取有确凿证据者。其中对钱笺的解读有较多回应,则因钱说影响较大。就这些来说,谢注注意继承旧说,又不为古人所困,充分吸取现代学术各方面的进展,使全书注释达到很高水平。

谢注所引文献,尽可能依据第一手文献,尽量不据他书转引。比如最早记载杜甫死于耒阳牛肉白酒的郑处晦《明皇杂录》,原书已不传,通行本为清人补录,此段记载脱漏很多。谢注所引为据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六三所引,可见讲究。

新闻文献之利用,谢注较萧注有很大推进。韦济墓志,两家都已经引及,以为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可断作于天宝九载韦任左丞后,萧注更据“即将西去秦”以为作于十一载春,似更合理。郑虔墓志,萧注仅在张忠纲后记中提及,未能逐篇征引,谢注则利用较充分。《寄董卿嘉荣十韵》,前人对董为何人没有解释,谢注引杨谭《兵部奏劾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》,知董姓为西山羌族部落酋长,又引敦煌所出《历代法书记》,知道杜鸿渐入蜀时,有“归诚王董嘉会”,疑嘉会、嘉荣为一,是悉州归诚郡首,从而对该诗所述事实,以及杜甫与严武幕中羌人酋长的交往,提供确证。《历代法书记》是记载禅宗保唐一系的重要典籍,其中提到永泰二年杜鸿渐蜀幕诸人对无住禅师的崇拜,提到与杜甫交游人物有杜济、鲜于叔明、吴郡、李布、韦夏有、狄博济等,时在杜甫离成都以后,但对杜甫蜀中交往和诸诗的理解,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如《寄狄明府

(下转13版)